

傳記

總傳

別傳

史料

.....

这些历史著作形式的分类号，可以加在任何主题的通史或断代史的时代之后。别传(个人传记)可以按生年排或姓名排。对于有大量传记资料的个别人物还可以在排列号之后加上区分号以区别“生平事业”、“生活片段”、“年谱”、“日记”、“评论”等等。这种区分也可用一种专用复分表来表达。这类技术性問題在编制分类表时是不难解决的。当然，这种详细的分类只是在大型图书馆内对于个别人物才用得着，实际应用的机会是很少的。

这样，就不必像目前某些分类表那样，在学科史下面并列历史和传记两目（如十进分类法的09和092），因为那样做还是将传记的书和历史的书分割

开了。

这就是我建议的处理传记书籍的办法。

当然，有些读者还习惯于按“传记”、“日记”、“年谱”等等形式类目来找书的。在有条件的图书馆也不妨以这些类目编制互见款目，置于分类目录里历史部（大类）历史辅助科学的最后部分。但是读者掌握了上述传记书籍处理办法之后，是不难找着他所需的资料的，并不是非要这种以形式为主的互见类目不可。

最后还当说明，上述的意见是从图书分类应以集中同一主题的资料为主这一原则出发的。而图书按形式分类，在一定条件下，也不能否认，有其便利之处。形式类目在图书分类体系究竟应占有什么地位牵涉到图书分类的一个基本问题，非本文范围所及，就暂不讨论了。但像“传记”类这样的形式类目之应当取消我以为是不应该有什么疑问的。

学 习 札 记 三 则

張 遵 儉

一、什么是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

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基本功”。研究技术科学先要学好数理化；画家都要具有素描的功夫，终身持之不变；京剧演员的扇子、水袖、骑马、起霸……都是基本功。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是什么呢？

图书馆是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用什么工具为基础服务呢？它的工具是图书。我们常常说，图书馆员要搞好工作，应该做到“三了解”——了解形势、了解读者，了解图书——了解图书应当是我们业务学习的基本内容，所以说学习“图书知识”是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

明确这个问题是很有好处的。有的人说，图书馆学概论，中外语文，各学术概论等等是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其实似是而非。因为这些不是每一个图书馆员所必须共同掌握的东西。

若说图书知识有深有浅，无穷无尽，信然。可是素描功夫何常无深浅之分呢、其它各行各业基本功也是如此。问题在于只要是身为图书馆工作者，从

练习生一直到馆长，从农村图书室管理员一直到国家图书馆的研究员，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图书知识，不然便无法进行工作。钻得深的人可以博古通今，贯通中外，以至于成一家之言，成为专科目录学家。初参加图书馆工作的人，也必须了解眼面前的一些书，进而逐步扩大眼界，熟悉更多的书，多多则益善。不走这条路，是很难胜任工作的。打个比方：“王若飞在狱中”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好书，发行不久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假如有这么一个图书馆工作者，在这书出版了许久以后的今天，还不知道有这么一部书，读者向他问起来，他竟至瞠目不知所答，谁又能说他是一个称职的馆员呢！当然，图书馆员们由于工作需要不同，由于文化知识水平不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知识基础出发，去了解“王若飞在狱中”这部书。有的人为了写书评或做报告要读好几遍，有的人只须了解内容梗概就可以答复读者咨询，这中间是有差别的，并且应当是有差别的。

对于冲激性很强的书——如“王若飞在狱中”，

每个图书馆工作者最低限度也要知道个书名。当然还有很多书，不必要每个人都去熟悉的。在日常工作中，采取边干边学的方法，各个图书馆员可以从各自的岗位工作需要出发，去熟悉某一门类或某几门类的图书资料，去熟悉某种文字或某几种文字的图书资料，有目的、有方向地积累图书知识，以期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图书馆工作者熟悉图书知识，是业务训练的“基本功”，必须持之以恒，并从各人的具体条件出发，逐步积累知识，大体上通过一个由浅入深，由博返约的过程，终会有所成就的。

二、关于业务辅导工作

过去几年公共图书馆系统的业务辅导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我看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农村中建立图书馆（室）的蓝图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机械地晒印在一起了。因而产生在公社设图书馆、生产大队设图书室、生产队设图书站等等一系列的想法。这样把国家公共图书馆系统中，省、市、县图书馆的建制，简单地套用到公社体制上去，是并不一定恰当的。

几年以来，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为了适应组织生产和安排生活的需要，经常有所变革。图书馆（室）也跟着变，以求适应，但结果却往往是把书变散失了，活动变得中断了，甚至把个建立不久的图书馆（室）闹散了架，造成损失。

农村图书室的建置有它特定的条件，它不能脱离经济基础与教育基础。经济基础与教育基础反映着群众的需要与建馆的可能，二者缺一不可。各县、各公社、各生产队的经济条件和教育文化水平有很大的差别；某个生产队可以建室，某个公社不具备建室条件，……某几个队可以联合起来搞，某地的图书室应当附设在某个学校里……都要因地制宜，都要取决于教育方面与经济方面的条件。我们往往看到：某个生产大队宁肯花几十块钱包一场电影，但是不愿意建立一所图书室。因为包一场电影，全队老幼都可以走来欢欢喜喜地欣赏一晚，可是建立图书馆（室），则只能供应少数人——脱盲的青壮年与在校学生——阅读，面太窄了，队领导当然得考虑考虑。一般地说，在一个农村图书室里，基本读者与当地居民点总人口的比例应该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其中脱盲青壮年又必须占二分之一以上。不够这个条

件，只能说群众基础太薄弱了，不宜建馆（室）。我们过去所想的，按着公社体制，层层铺开的办法，是不切实际的。

此外，有些同志往往把在农村中开展图书活动和在农村中建立图书室的组织混淆在一起。其实农村中的图书活动是古已有之的。农村图书室的普遍建立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创举。在农村中，只要有读书识字的人，就一定有图书活动，一般以个人活动为多，集体活动较少。图书馆工作者可以采取书店工作者的办法，定点、定线、定期巡回借还书籍，或委托学校教师代办。这样，没有图书室，一样可以有图书活动。开展活动不同于建立组织，不带有任何强迫性质，不要求创设任何条件，不要钱也不要人，在农村中，应该受到上上下下普遍欢迎的。

三、对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分期问题的一些初步想法

把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发展分为三个大的时期：（1）1840年以前时期；（2）1840—1949年时期，（3）1949年建国以后时期。我认为是妥当的。

关于1840—1949年时期内怎样划分阶段的问题，我却不赞成必须与中国近代现代史分期一致的想法。我认为根据重大历史事件，结合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点考虑，来划分阶段，更妥当些。

在1840—1949年期间，中国图书馆事业适应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洋奴买办势力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要求发展着。1921年以后，我国无产阶级壮大起来，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图书馆事业在发展上也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要求。这一段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复杂的，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1840—1909时期；②1909—1921时期；③1921—1949时期。1909年是辛亥革命前两年，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最初建成的年代。它标志着我国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冲激，在封建统治阶级官私藏书楼的基础上，开展了我国的“公共图书馆运动”。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年，恰也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创始的年代。它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式开始。上海通信图书馆是上海市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创

办的第一所新型图书馆。

早在清光绪 22 (1896) 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就有一个奏折“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李端棻和梁启超是郎舅至亲，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梁启超的手笔。梁启超从广东来，首先到上海，读遍了当时翻译过来的西书（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是“西学书目表”），巩固了维新变法的思想。推广学校一折，又提到“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盖有数端”，第一件事就是“设藏书楼”。他有两个根据：一是“高宗纯皇帝……特于江南设三阁，恣人借观。自此以往，江浙文风、甲于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二是“泰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因此要求在“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收藏书籍则以“殿板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为主。此折既上，“于是浙冀鲁湘各省，皆于设学之初，设有藏书楼，为现代图书馆事业之导始。”（陈训慈：中国之图书馆事业。）自 1909 年京师图书馆和江南图书馆落成开馆以后，清廷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各省陆续建馆，旧日的藏书楼纷纷改名，扩大借读范围，往近代资产阶级图书馆的方向又跨进了一步。

近代资产阶级图书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即所谓“公共图书馆运动”。这个运动也是跟着教育普及运动俱来的。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工人阶级的队伍壮大了，觉悟提高了，产生了进行阶级教育、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要求。资产阶级为了更残酷地压榨工人，也同意提高工人们的文化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更娴熟地掌握机器，产生更多的利润。于是，美国和欧洲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提出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口号，公共图书馆作为一项促进成人教育的设施，也就兴办起来。后来竟形成“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的“盛况”。这种“盛况”为清末提倡新学，主张变法的人看到，就作为效法西洋的一项措施，和仪器院、译书馆、报馆等等一起提了出来。大体上确定了藏书楼往资产阶级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方向。

宣统二年（1910）韦棣华女士以传教士身份来华，按照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形式，创建武昌文华公书林。进一步在组织图书馆工作方面为我国的藏书楼

树立了“效法西洋”的模楷。自兹而后，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就成了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封建地主阶级“保存国粹，造就通才”的，维新改良派贮藏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政治、科学书籍的共同体。及至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遂又增加了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宣传的任务。1949 年全国解放，我们所接管的，正是这样一所一所的，残破不全的、气息奄奄的“公立”图书馆。

至于以 1921 年断代，如前所说，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事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式开始。在 1921 年以前，革命事业的创始人及许多革命前辈曾经利用过旧图书馆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活动的阵地。但是，上海通信图书馆毕竟不同，它“在创设之初就是带着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姿态出现的……一开初就有自己的鲜明的战斗纲领和奋斗目标。”（见本刊 1961 年第 2 期第 42—43 页）从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文化事业——图书馆的重大意义来说，这是个起点，揭开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新页，应该据以断代。

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

1960 年概况

随着苏联科学、文化的发展，列宁图书馆的工作在 1960 年也有了很大的开展，截至 1961 年 1 月止，列宁图书馆已拥有藏书 21,243,322 册。其中包括外文书 8,069,670 册。工作人员有 2,142 人，其中包括图书馆业务工作者 1,990 人，技术和服务人员 452 人。业务工作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 1,350 人；其中有 64 人是候补博士。1960 年登记的读者是 182,301 人；来馆阅览的有 2,282,199 人次；馆内阅览室共出借了书籍 11,820,631 册；外借了书籍 434,437 册；完成了书目咨询 135,493 件；举办了各种讲座、报告会、文艺晚会 299 次；入藏了书籍和不定期的出版物 508,804 册；入藏了杂志 478,494 册；收到了报纸 1,600,670 份；举办了各种展览 793 次；国际交换收到了国外书刊 213,593 册。寄出了书刊 254,371 册；共整理了书籍 318,754 册，杂志 255,194 册，报纸 12,762 册（全年合订本）；摄制缩微书影 7,829,622 份；装订了书刊 267,257 册；此外还编辑出版了 262 种出版物。

（建明）